

印刷傳媒之崛起與宋詩特色之形成

張高評*

提 要

雕版印刷有「易成、難毀、節費、便藏」之長處，又有化身千萬，無遠弗屆之優勢。因此，足與寫本（含藏本、稿本、抄本）競妍爭輝。論其利用厚生，便利士人，徵存、傳播、發揚宋朝以前及當代文獻典籍，繼往開來，貢獻極大。對於宋代士人而言，雕版印刷改變知識傳播之方式和質量，進而影響閱讀之態度、方法，和環境，乃至於創作之習性、評述之體式、審美之觀念，和學術之風尚，對宋代之文風士習頗多激盪。因應右文崇儒政策，科舉考試、書院講學、教育普及、著書立說，皆因印刷傳媒之推助，而有加乘之效果。由此觀之，印刷傳媒堪稱為唐宋變革之催化劑，宋代之為近世特徵之促成者。本論文側重探討四部典籍之刊行與兩宋文明昌盛之可能關係，考察宋代印刷傳媒繁榮、圖書流通便捷，對於「詩分唐宋」之可能影響，有別於目錄版本學之論述，亦不同於書籍紀傳體之研究。對於學界探討唐宋變革、宋型文化、詩分唐宋、宋詩特色諸課題，或有參考觸發之價值。

關鍵詞：印刷傳媒、四部典籍、圖書流通、宋詩特色、詩分唐宋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The Rise of Printing media and the Formation of Song Poem Features

Chang Kao-Pi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trengths of woodcut printing in the early Song Dynasty are characterized by accessibility, duration of preservation, cost effectiveness, and the ability to be stored easily. Furthermore, woodcut printing facilitated the circulation of literature, enabl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Due to these qualities, therefore, woodcut printing enjoys the same status with that of transcripts (bibliolatries, manuscripts, codices). Accordingly, woodcut printing contributes a great deal to preserving, spreading, and promoting literatures written before and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thus passing down cultural heritage. In fact, the emergence of woodcut printing has transformed not only the way through which knowledge is disseminated, but the quality of the information as well. This, in turn, influences Song intellectuals' reading attitudes, perspectives, and environment, and leads to shifts in the writing style, the form of critique, aesthetic taste, and intellectual milieu of the Song Dynasty. From a macro-perspective, such an emergence also enables and assists the government to propel its Confucian policy, which includes holding civil examinations, giving lecture in the academy, turning education into an all-pervasive practice, and encouraging publication. Printing technique, therefore, can be termed as the catalyst for both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y's reformations, an invisible hand that marks the Song Dynasty as the forerunner of modernity. The aim of this paper, then, centers on the publication of *Si Bu Dian Ji* (四部典籍) maybe relate the prosperity of the civilization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prosperity of printing media and the spread of books in the Song Dynasty, maybe influence "Tang and Song poetic demarcation". Distinguishing it

from the study of bibliography and historiography with the hope of shedding light on the current comments concern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y's reformations, the culture paradigm of the Song Dynasty, the divisions of poetry betwee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ng poetry.

Keywords: printing media, Si Bu Dian Ji (四部典籍), the books circulate, Song Poem Features, Tang and Song poetic demarcation

印刷傳媒之崛起與宋詩特色之形成

張高評

一、雕版印刷之崛起與「唐宋變革」

日本京都學派內藤湖南（1866-1934）、宮崎市定（1901-1995），先後研究中國歷史分期，提出「唐宋變革」說，「宋代近世」說。¹一時陳寅恪、鄧廣銘、傅樂成、繆鉞、錢鍾書研究歷史和詩歌，皆受其影響。考京都學派所謂「唐宋變革」之分野，宋代之為「近世」之特徵，學界歸納京都學派之說，其項目如：政治、科學、文官、黨爭、平民、經濟、兵制、法律、學術、科技、文藝；特別強調宮崎市定補充：知識普及，和印刷術發明。²筆者以為，印刷術發明，助長知識普及，促成科舉取士、落實右文、崇儒之政策。印刷圖書之為傳媒，對於宋朝以前及當代的文獻典籍，頗能作較完整而美好的保存，從而有助於流傳與發揚，對於文化傳承，貢獻極大。對於宋代士人而言，雕版印刷改變知識傳播的方法和質量，進而影響閱讀的態度和環境、創作的習性和法度、評述的體式、審美的觀念，和學術的風尚，對宋代之文風士習頗多激盪，是唐宋變革的催化劑，宋代之為近世特徵之促成者。影響如此深遠，然學界於此關注並不多。

（一）印刷傳媒之影響值得探究

紙張的輕薄短小，配合雕版印刷之「日傳萬紙」，對於知識流通，圖書傳播，

¹ 內藤湖南、宮崎市定之「宋代近世說」，蓋以唐宋之際「轉型論」為核心，自然推導出「宋代文化頂峰論」及「自宋至清千年一脈論」，說見王水照主編《日本宋學研究六人集》，〈前言〉，淺見洋二《距離與想像——中國詩學的唐宋轉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2），頁 2-5。

² 參考錢婉約《內藤湖南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4.7）；張廣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5-71；柳立言《何謂「唐宋變革」？》，《中華文史論叢》2006 年 1 期（總八十一輯），頁 125-171。

必然產生推波助瀾之效應。就宋代而言，標榜右文崇儒，雕版印刷對於科舉考試有何影響？對於書院講學、教育普及、學風思潮、創作方式、評述法度、審美情趣、文風士習，生發何種效應？就歷史而言，內藤虎次郎、宮崎市定提出「唐宋變革」、「宋代近世」說，雕版印刷是否為其中之催化劑？是否如谷登堡（Gutenberg Johann，1397-1468）發明活字印刷一般，形成「變革的推手」？就文化類型而言，王國維稱美天水一朝之文化，「前之漢唐，後之元明，皆所不逮」；「近世學術，多發端於宋人」；陳寅恪亦有「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說；³傅樂成則提出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之分野，⁴文化演變之不同，印刷傳媒居於何種地位？就詩歌而言，繆鉞《詩詞散論》標榜「唐宋詩異同」，⁵錢鍾書《談藝錄》強調「詩分唐宋」，⁶雕版印刷是否即是其中之關鍵觸媒？谷登堡活字版流行，印刷傳媒在西方之繁榮發達，促成宗教革命、文藝復興；在宋代，印刷傳媒與寫本、藏本競奇爭輝，是否亦生發類似之激盪？目前學界對此一創新課題，尚未多加關注。

錢存訓為研究書史及印刷史之權威，參與李約瑟《中國科技史》之修纂，負責「印刷術」之撰稿。⁷有關近代中外學者對於印刷史之研究，錢氏歸納為三個主流，從而可見印刷史探討之大凡，權作本文研究現況之述評。下列兩個主流研究，為目前學界致力最多者：

近代中外學者對於印刷史的研究，大概可歸納為三個主流：一是傳統的目錄版本學系統，研究範圍偏重在圖書的形制、鑑別、著錄、收藏等方面的考訂和探討。另一個系統可說是對書籍作紀傳體的研究，注重圖書本身發展的各種有關問題，如歷代和地方刻書史、刻書人或機構、活字、版畫、套印、裝

³ 王國維〈宋代之金石學〉，《靜安文集編編》，（上海：上海書店，1983），頁70；陳寅恪〈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金明館叢稿》，（臺北：里仁書局，1982），頁245-246。

⁴ 傅樂成〈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原載《國立編譯館館刊》一卷四期（1972.12）；後輯入《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7.9），頁339-382。

⁵ 繆鉞《詩詞散論》，〈論宋詩〉，（臺北：開明書店，1977）。

⁶ 錢鍾書《談藝錄》，一、「詩分唐宋」，（臺北：書林出版公司，1988.11），頁1-5。

⁷ 錢存訓，英國李約瑟東亞科技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印刷史博物館顧問，編著有《書于竹帛》、《中國科學技術史：紙和印刷》、《中國書籍、紙墨及印刷史論文集》、《中美書緣》等有關圖書目錄學、書史、印刷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之論著。

訂等專題的敘述和分析。⁸

傳統目錄版本學之研究，以及圖書本身發展之研究，學界論著繁夥，貢獻良多。⁹探討日本、韓國、越南之漢籍雕版，研究主題與焦點，亦不出上述兩大系統。至於探索印刷傳媒之影響與效應，所謂「印刷文化史」之研究，則關注不多，值得開發。¹⁰錢存訓先生曾對印刷文化史探討之層面和方法略作提示：

近年以來，更有一個較新的趨向，可稱為印刷文化史的研究，即對印刷術的發明、傳播、功能和影響等方面的因果加以分析，進而研究其對學術、社會、文化等方面所引起的變化和產生的後果。這一課題，是要結合社會學、人類學、科技史、文化史和中外交通史等專業，才能着手的一個新方向。至於印刷術對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有沒有產生影響？對現代西方文明和近代中國社會所產生的影響，又有什麼相同或不同？印刷術對社會變遷有怎樣的機能？這些都是值得提出和研究的新課題。¹¹

試想：宋代之知識傳播，除傳統之寫本（含稿本、抄本、藏本）作為持續穩定之媒介外，宋代士人更多選擇「易成、難毀、節費、便藏」，化身千萬，無遠弗屆之雕版印刷（印本圖書）。圖書傳播之多元，尤其是印刷傳媒之激盪，究竟生發何種文化上之效應？學界論著用心致力於此者實不多見。相對於谷登堡發明活字印刷術，基本影響為書價的降低和書籍的相對平凡化。另外，還影響到閱讀實踐的改變，加強了一種古老的變革，諸如「不同的稿本不再被採用，著作法規也在逐漸改變，

⁸ 錢存訓《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第一章緒論，四、〈中國印刷史研究的範圍和發展〉，（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5），頁 20-21。

⁹ 參考宋原放《中國出版史料》（古代部分）第二卷，〈中國古代出版史料及有關論著要目〉，（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10），頁 576-591。

¹⁰ 有關印刷文化史之研究，管見所及，有錢存訓《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第十章（四）〈印刷術在中國社會和學術上的功能〉，頁 356-358；又，《中國古代書籍紙墨及印刷術》，〈印刷術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功能〉，（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12），頁 262-271；（日）清水茂著，蔡毅譯，《清水茂漢學論集》，〈印刷術的普及與宋代的學問〉，（北京：中華書局，2003.10），頁 88-99。（美）露西爾·介（Lucile Chia）〈留住記憶：印刷術對宋代文人記憶和記憶力的重大影響〉，《中國學術與中國思想史》（《思想家》II），（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4），頁 486-498；（日）內山精也《傳媒與真相——蘇軾及其周圍士大夫的文學》，〈「東坡烏臺詩案」考——北宋後期士大夫社會中的文學與傳媒〉、〈蘇軾文學與傳播媒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8），頁 173-292。

¹¹ 同註 8。

文學領域進行重新組織（有關作者、文本和讀者）。印刷的發展和通俗化，改變了閱讀的環境。正如蒙田所云：爲了醉心于狂熱的閱讀而沉浸書中，任由自己或遐想，或創新，或遺忘」。¹²法國年鑑學派大師費夫賀（Lucien Febvre）與印刷史學者馬爾坦（Henri-Jean Martin）合著《印刷書的誕生》（*The Coming of the Book*）強調：「印刷帶動文本的大規模普及」；「這顯然是種變遷，且變的腳步還頗快」，同時提出印刷書促成文化變遷結果之種種推測：

大眾究竟需要書商與印刷商提供他們哪類書刊？印刷究竟令傳統的中世紀文本，普遍到何種程度？這些舊時代的傳承物，又被印刷術保存住多少？印刷機驟然突破了既有的智識作品保存媒介，是否也助長了新的文類？或者情況正好相反，是早期的印刷機大量印刷了許多傳統的中世紀書籍，才讓這些作品的壽命意外地延長數十年，一如米什萊（Michelet, Jules, 1798-1874）所言？我們將試著找出這些問題的答案。¹³

士人的閱讀期待和印刷書籍之品類，是否相互爲用？印刷書之爲傳媒，對於宋代教育之相對普及，影響程度如何？唐代及前代典籍因雕版流傳後世者，存留多少？印刷傳媒引發知識革命，是否催生新興的文類？或者更加保固傳統文體，而蔚爲歷代文學創作之典範？凡此推想，覆案宋詩、宋代文學、及宋代詩學之研究，多可作爲對照、觸發。雕版印刷在宋代之崛起繁榮，是否也有類似西方之谷登堡效應？錢存訓所提「對印刷術的發明、傳播、功能和影響等方面的因果加以分析，進而研究其對學術、社會、文化等方面所引起的變化和產生的後果」，這一系列的創新研究課題，正是筆者草撰本文之企圖。筆路藍縷，文獻不足徵，此創新研究課題必然面對許多空白和疑難，請學者方家多多指正。

（二）宋代印本崛起，與寫本藏本競妍爭輝

《後漢書·蔡倫傳》稱：紙張發明普及之前，「縑貴簡重，并不便於人」，蔡

¹²（法）弗雷德里克·巴比耶（Frederic Barbier）著，劉陽等譯《書籍的歷史》（*Histoire DU Livre*），第六章，4，閱讀，（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1），頁132-133。

¹³費夫賀（Lucien Febvre）、馬爾坦（Henri-Jean Martin）著，李鴻志譯《印刷書的誕生》（*The Coming of the Book*），一、從手抄本到印刷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12），頁248-249。

倫「造意為紙」，天下莫不從用，於是替代簡帛，知識傳播進入寫本時代。抄寫作為圖書複製，知識傳播的媒介，較之簡帛雖有長足進步，仍然難愜人意。為追求愛日省力，便易於人，乃有雕版印刷之發明：隋唐以來，先民借鏡石刻傳拓、璽印鐫刻、漏版印布之技法，結合造紙製墨傳統工藝，乃發展為雕版印刷之刊刻圖書¹⁴。

自五代長樂老馮道主持刊印《九經》暨《五經文字》、《九經字樣》，¹⁵歷經宋朝之崇尚文治，官府民間同步提倡雕版印刷，促使印刷術成為知識傳播之利器，導致宋代文化與文明的昌盛。雕版印書作為知識革命之技術，其最大效益在複製圖書之數量多，速度快，誠如沈括所云：「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¹⁶雕版與活字印刷之效率並無不同。於是大量複製，造成廣泛傳播，多元而豐富閱讀，普遍而隨機接受，無遠弗屆，影響深遠。蓋雕版圖書每次約印百部，將本求利，他日需要再刷百部，可持續印刷不已。印本圖書之流通，引發許多傳播和接受的問題，大抵而言，雕印之品類面向，與消費大眾之需求消長相當，民生日用、科舉考試、學術思潮、文學風尚，在在改變傳播之格局，左右傳播之心態。因此，雕版印刷於宋代之繁榮，可能因此形成了印本文化，塑造了宋型文化，遂與唐型文化分道揚鑣。

雕版印刷之流行，在複製圖書方面，數量多，品質佳；在知識傳播方面，接受便易，而又品類多元，基於因應朝廷右文政策、科舉取士大規模錄用人材；中央至地方官學、童蒙教育與書院講學之蓬勃發展，圖書消費市場需求極大¹⁷，因此，傳統之手寫謄抄，已緩不濟急，雕版印刷之高質量複印圖書，具有易成、難毀、節費、

¹⁴ 李致忠《古代印版通論》，第二章〈雕版印刷的發明〉，（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11），頁 8-16。

¹⁵ 《五代會要》卷八〈經籍〉：「後唐長興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周廣順三年（953）六月，尙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進印板九經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共一百三十冊。」

¹⁶ 沈括《夢溪筆談》卷十八，〈技藝〉，胡道靜新校注本，（香港：中華書局，1987.4），頁 184。

¹⁷ 兩宋科舉取士：計進士 42390 人，諸科 15054 人，特奏名 33742 人，計 91186 人，詳何忠禮《兩宋登科人數考索》，《宋史研究集刊》第二集，1988 年。張希清考證：宋朝每年經由科舉入仕之人數，平均為 361 人，約為唐朝的 5 倍，元代的 30 倍，明代的 4 倍，清代的 3、4 倍。可以說，宋代科舉取士之多，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絕後」的！詳參張希清〈論宋代科舉取士之多與冗官問題〉，《北京大學學報》1987 年 5 期；傅璇琮、謝灼華《中國藏書通史》第五編第一章〈宋代藏書的社會文化背景〉，（寧波：寧波出版社，2001），頁 288-296。

便藏諸優點，更有化身千萬，無遠弗屆之特質。凡此，皆頗能滿足士人之期待。官刻本、家刻本、坊刻本既琳瑯滿目，於是「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市人轉相摹刻，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於是所謂「印本文化」逐漸形成¹⁸。印本與寫本爭輝，蔚為宋代文化之登峰造極，宋型文化因印刷傳媒之加持，遂與唐型文化漸行漸遠，而呈現獨特不同之風貌¹⁹。上述觀點，只是筆者閱讀所及，「想當然耳」之推論，尙待文獻之論證。

宋代雕版印刷之繁榮昌盛，官刻、家刻、坊刻崢嶸競秀，蔚為書業市場之熱絡。影響所及，造成宋代公私藏書豐富，書目編纂亦隨之繁多，一代圖書度藏及流通之大凡，可由版本學、目錄學窺見一斑²⁰。印本圖書崛起，與寫本（含稿本、抄本、藏本）並行流通，於是「刻書以便士人之購求，藏書以便學徒之借讀」，刻書藏書之雙重便利，寫本藏本與雕版印刷之競秀爭流，勢必造成宋代之知識革命。²¹此種圖書傳播方式，也自然衝擊創作生態與學術風尚。宋代詩人之創作，自編或他編之詩集，藉助雕版印行流通者多，²²傳播既便捷，「奇文共賞，疑義相析」，鼓舞砥礪，於是名家大家輩出。「破體」現象，與「出位之思」，蔚為宋代文學之創作傾向之一，源流正變之乘除消長，造成文體之移位與重組，²³其中自有印本文化、寫本文化，與藏書文化之交相作用在。

需要強調的是，雕版印刷由運用、推廣、至流行、繁榮，是因勢漸進的，不是突然發達的，其中以寫本抄本之傳統方法複製圖書，仍然佔重要比例。宋初太祖太

¹⁸ 張高評〈雕版印刷之繁榮與宋代印本文化之形成——印本之普及與朝廷之監控〉（上），《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十一期，（高雄：麗文文化公司，2005.12），頁 1-34。

¹⁹ 傅樂成《漢唐史論集》，〈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臺北：聯經文化公司，1977.9），頁 339-382。

²⁰ 曹之《中國印刷術的起源》，第十章，一、宋代私人藏書之盛；二、宋代書目之多，（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3），頁 376-413。

²¹ （美）艾朗諾〈書籍的流通如何影響宋代文人對文本的觀念〉，《第四屆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10），頁 98-114。

²² 有關宋人文集之編纂、傳抄、雕印，可參考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上下），（北京：中華書局，1999.11）。

²³ 吳承學《中國古典文學風格學》，第八章〈從破體為文看古人審美的價值取向〉，（廣州：范城出版社，1993.12）；葉維廉《比較詩學》，〈「出位之思」：媒體及超媒體的美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3.2），頁 195-234。

宗朝詔求遺書，往往借善本繕寫度藏；整理古籍或著書立說，進呈御覽，其良善者，朝廷給紙筆「重別寫進」一部，自是抄本。無論經、史、子、集，撰成之書稿；或當下書寫傳播之文字，皆是寫本。另外，寫本之大宗，尤在崇文院、祕閣等官方所藏寫本，為搜訪遺佚，而「借本抄填之」；為補足劫餘，往往「重寫書籍，選官詳覆校勘」；或「請降舊本，令補寫之」。《宋會要輯稿》〈崇儒〉卷四載：宣和五年（1123）詔令：「搜訪士民家藏書籍，悉上送官，參校有無，募工繕寫，藏之御府」。淳熙六年（1179）六月尋訪四川圖書，遍查各路州軍官書目錄，「如有所闕，即令本司抄寫，赴祕書省收藏」；如此而收藏者，自然以寫本居多。至於民間藏本，亦以寫本為主，今人袁同禮曾言：「宋代私家藏書，多手自繕錄，故所藏之本，抄本為多」。論者謂：宋代私人藏書家可考者約 500 人以上，其中以抄書著稱者泰半²⁴。宋代圖書閱讀，知識傳播，手抄寫本之地位，仍然不可忽視。

雕版圖書之為印刷傳媒，其「節費、便藏」之特色，以及化身千萬、無遠弗屆之優勢，最有助於知識之傳播，有功於圖書之保全流佈，可以避免散佚殘缺。日本在平安朝後期（983 年以後），宋刊本開始東傳日本，日本宮內廳書陵部尚珍藏 144 種宋元版（刻本）漢籍。其傳播方式，或以貴族知識分子，或以禪宗僧侶，或以商品經濟²⁵。以宋代域外漢籍之傳播而言，日本宮內廳書陵部御藏宋人宋刊有《太平御覽》、《畫一元龜》、《花果卉木全芳備祖》、《景文宋公集》、《誠齋集》、《玉堂類稿》、《太平聖惠方》、《魏氏家藏方》、《嚴氏濟生方》、《和荆局方》等十種；內閣文庫漢籍，則有「重要文化財」宋人宋刊《周易新講義》、《廬山記》、《史略》、《東坡集》殘本、《類編增廣穎濱先生大全集》、《豫章黃先生文集》、《平齋文集》、《梅亭先生四六標準》等九種，其他又有足利本「日本國寶」宋刊

²⁴ 曹之《中國古籍版本學》，第二編第一章，三、〈宋元寫本〉，（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5），頁 111-116；袁同禮〈宋代私家藏書概略〉，《圖書館季刊》二卷一期；葉昌熾《藏書紀事詩》，潘美月《宋代藏書家考》，（臺北：學海出版社，1980）；方建新《宋代私家藏書補錄》、《北宋私家藏書再補錄》、《南宋私家藏書再補錄》，分刊《文獻》1988 年 1-2 期、《古文獻研究》（1989）、《宋史研究集刊》（1988）。

²⁵ 安平秋〈中日合作複製日本國宮內廳書陵部藏宋元版漢籍之現狀〉，嚴紹盪〈漢籍東傳日本的軌跡與形態〉，漢學研究中心、高校古委會主辦「第三次兩岸古籍整理研究學術研討會」，2001 年 4 月 18-19 日，台北市。

《周易注疏》、《尚書正義》、《禮記正義》、《六家本文選》等等。²⁶漢籍之傳播，當時宋朝若非以雕版印刷複製圖書，光靠抄本寫本流布，厚重圖書將如何漂洋過海，遠渡東瀛？即使流傳，恐不如是之量多完好與多元。

自宋朝立國，高麗遣使往來不斷，成宗、宣宗崇儒尚文，漢籍在東國傳抄及刊刻者漸多，至高麗後期，此風未歇。下至朝鮮時期，漢籍傳入更多：考其來源，或為趙宋朝廷贈送，或為商賈攜入，或為麗、鮮兩朝使臣購買，不一而足。漢籍既經流入，無論官私，或傳鈔、或刊刻，從而廣泛傳播於東國，影響深遠。高麗、朝鮮兩朝，傳入之宋人四部典籍，計經部 91 種，史部 65 種，子部 136 種，集部 123 種，共 415 種。麗、鮮兩朝圖書之傳播與接受，大抵具有實用性和通俗性之特徵，其中有不少雕版印書，形成域外兩宋漢集之珍本。²⁷至於印刷圖書南傳至越南，始於北宋景德二年（1005），至元代成宗元貞元年（1295），三百年間共六次頒賜《大藏經》給越南，其間未聞越南有仿刻之事。考諸歷史，遲至陳英宗興隆四年（1296），安南始有翻雕刊行《大藏經》之舉。下至明正統年間（1443-1459）越黎兩度派遣紅蓼人梁如鵠來華傳習雕版技藝，於是刻書業始盛。²⁸最近學界倡議東亞漢籍版本學（印本）之研究，域外漢籍之傳播，已引發若干關注。漢籍傳播所以無遠弗屆至東瀛與東國，乃至域外越南，²⁹其中雕版印書之易成、難毀、便利、快捷，最有助於圖書流通，知識傳播。

大概雕版印刷之為知識傳媒，相較於寫本（抄本），有諸多「便於民」之優勢，

²⁶ 嚴紹盪《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下篇第六、第七、第八章，（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6），頁 212-240；頁 257-262。又嚴紹盪《日本藏漢籍珍本追蹤紀實》，其中敘錄宮內廳書陵部宋人寫本 1 種，宋刊本 72 種；日本國會圖書館宋刊本 7 種，日本國家文書館宋刊本 11 種，東京國立博物館唐寫本 6 種，宋刊本 4 種；足利圖書館宋刊本 6 種，金澤文庫宋刊本 2，宋寫本 1；靜嘉堂文庫宋刊本 27 種，天理圖書館宋刊本 7 種，御茶之水宋刊本 8 種，真福寺 5 種，東福寺 14 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5）。

²⁷ 鞏本棟〈宋人撰述流傳麗、鮮兩朝考〉，張伯偉編《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2005.5），頁 323-386。

²⁸ 劉玉珺〈越南古籍刊刻述論〉，參考同上註，頁 269-271。

²⁹ 陳正宏〈東亞漢籍版本學序說——以印本為中心〉，張伯偉主編《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二輯，（北京：中華書局，2006.5），頁 21-28。鞏本棟〈論域外所存的宋代文學史料〉，《清華大學學報》2007 年第 1 期（第 22 卷），頁 32-45。

因此，才能藉「海上書籍之路」³⁰渡海東去，澤被域外，留存許多宋刊善本珍本，甚至於孤本。

二、四部典籍之刊行與兩宋文明之昌盛

印刷傳媒於宋代之崛起，以至於「未有一路不刻書」，其盛況可以想見。圖書複製之方式，除傳統之寫本（抄本、藏本）外，更有量多、質優、價廉、便利之印本，對於知識之傳播流布，必然產生激盪與迴響。由於文獻不足徵，不得已，筆者乃據四部典籍之刊刻雕印，參酌商品經濟供需相求之原理，覆按兩宋文明之昌盛，推想印刷傳媒之熱絡，對於經學復興、史學繁榮，悅禪、慕道、崇儒之可能效應；進而論斷印刷傳媒、圖書流通對於詩分唐宋，甚至唐宋變革之可能影響。姑提出下列議題，以待方家論證：

（一）經籍之雕印與經學之復興

五代後唐之時，馮道主持《九經》之刊刻印刷，對儒家經典之傳播，貢獻良多。趙宋開國後，經籍之收集、整理、校勘、雕印，更不遺餘力。開寶五年（972），校勘印刷《尚書》、《經典釋文》；雍熙二年（985），刊刻《五經正義》，次年又刻印《說文解字》。端拱元年（988），國子監校勘刻印《易經》、《書經》；淳化五年（994），又陸續刊印《七經義疏》；至道二年（996），判監李至等校訂刻印《周禮》、《儀禮》、《穀梁》、《論語》等書。咸平元年（998），刻印《詩經》、《書經》；咸平三年（1000），國子監邢昺主持校訂刻印《論語》、《孝經》、《爾雅》等書。於是「經史正義皆具，書版大備」³¹。「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之文，經

³⁰ 王勇等著《中日「書籍之路」研究》，王勇〈絲綢之路與書籍之路—試論東亞文化交流的獨特模式〉，（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10），頁1-14。

³¹ 羅樹寶《中國古代印刷史》，第六章第二節〈宋代政府的印刷〉，（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93.3.），頁118-119。

雕版流傳，儒者講明「明體達用」之學，方有據依。宋學之發皇，因北宋經籍之刊行，藏本之流通，相得益彰，形成絕佳之觸媒與推助，自是一大關鍵。論者稱：宋代「儒學所以復興，諸經鐫印，蓋其一因」³²，其說得之。

宋代實施右文，國子監印書，曾倡導私人提供紙墨、工費，代為印刷。朝廷對於州縣學校、各地書院往往頒賜《九經》，便利經籍之普及，促進教育之發展。如《宋會要輯稿》所云，經書頒賜，崇儒右學，志在推廣可知：

太宗端拱二年（己丑，989），五月三十日，康州言：「願給九經書，以教部民之肄業者。」從之。

至道二年（丙申，996），七月六日，賜嵩山書院額及印本九經書疏，從本道轉運使之請也。

大中祥符三年（庚戌，1010），二月，賜英州文宣王廟板本九經。

仁宗天聖六年（戊辰，1028），八月，江陰軍言：「重修至聖文宣王廟，頗有舉人習業，舊無九經書，欲乞支賜。」從之。

真宗咸平四年（辛丑，1101），六月，詔諸路郡縣有學校聚徒講誦之所，賜九經書一部。

淳熙八年（辛丑，1181），十一月二十九日，詔南康軍復白鹿洞書院，所有陳乞經書具數行下，令國子監印給。以知南康軍朱熹言：「太宗皇帝嘗因江州守臣周述之奏，詔以國子監九經賜廬山白鹿洞書院。……望降敕命，仍舊以白鹿洞書院為額，仍詔國子監印造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及板本九經注疏、論語、孟子等書給賜。」（《宋會要輯稿·崇儒二》〈郡縣學〉）

就經學之發展來說，宋代以《春秋》經傳最稱顯學，故本文舉《春秋》經傳之雕印為例。元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著錄《春秋》類百餘種，《宋書·藝文志》著錄專著約二百四十種，清朱彝尊《經義考》著錄約四百種以上；《四庫全書》《春秋》類著錄，宋人著述 38 部，689 卷；佔歷代《春秋》類著錄總數 114 部 1838 卷三分之一比重。其中有藏本寫本，更多的是刊印本。《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九，

³² T·F·Carter: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第十章,〈中國雕版印刷術之全盛時期〉,向達譯,原載《圖書館學季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1932.12。

《日講春秋解義》稱：「說《春秋》者，莫夥於兩宋」，實乃信而有徵之言。

南宋偏安，外患頻仍，於是《春秋》經傳版刻傳世者不少，如南宋國子監刊本《附音春秋穀梁傳注疏》、淳熙三年（1176）阮仲猷種德堂刊本《春秋經傳集解》、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本《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淳熙間撫州公使庫刊配補本《春秋經傳集解》、慶元六年紹興府刊宋元遞修本《春秋左傳正義》、嘉定四年胡槻江右計台刊本《春秋繁露》、嘉定九年興國軍學刊本《春秋經傳集解》、寶祐三年臨江郡庠刊本《春秋集注》、德祐元年衛宗武華亭義塾刊本《春秋集注》、南宋鶴林子氏家塾樓雲閣刊元修本《春秋經傳集解》、建安劉叔剛一經堂刊本《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紹熙間潛府劉氏家塾刊本《春秋經傳集解》、紹熙二年余仁仲萬卷堂刊本《春秋公羊經傳解詁》、紹熙間余仁仲萬卷堂家塾刊本《春秋穀梁傳集解》、隆興淳熙間胡安國《春秋傳》原刊本、乾道四年（1168）刊本《春秋傳》；又有南宋杭州地區刊本《春秋經傳》、南宋四川地區刊本《春秋經傳集解》、宋龍山書院刻本《纂圖互注春秋經傳集解》、元初相台岳浚荆谿家塾刻群經本《春秋經傳集解》³³。另外，南宋州縣政府所刻，淮南東路高郵局，紹興四年（1134）刻劉覺《春秋經解》十五卷；紹熙四年（1193），刻龍學孫公《春秋經解》十五卷。福建路南劍州，開禧元年（1205），葉筠刻《石林春秋傳》二十卷。臨江軍學於紹定六年（1233），刊刻張洽《春秋注解》十一卷，德祐元年（1275），衛宗武華亭義塾亦刻張洽《春秋注解》；袁州軍學於淳祐三年（1243），刻印《程公說春秋分紀》九十卷。至於私宅家塾刻書，則如岳珂刊《九經》，廖瑩中世彩堂《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³⁴。上述宋代刊本，乃千年之劫餘。然由《春秋》經傳版本之繁多，可以推想當時圖書傳播之廣被，以及影響之深遠。

（二）史籍刊刻與史學之繁榮

宋代史學，號稱空前繁榮。此與修史制度之完善、當代史之編修、歷史文獻之

³³ 參考李致忠《宋版書敘錄》，（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6）頁160-224。陳堅、馬文大《宋元版刻圖釋》，〈宋代版刻述略〉，（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頁9-20。

³⁴ 同註31，《中國古代印刷史》，頁117-147。

匯整、史部典籍之刊刻有關。於是史書數量空前增多，史書體例空前發展，史學範圍空前擴大。史料之編次、史書之修撰、又歸本於史官之選任與機構之設置諸修史制度³⁵。蓋史學可以經世，其功良多，或垂訓借鑑、或消除異說、或控制輿論、或頌揚德政、或倡導教化，故宋代朝廷重視之。由《宋史·藝文志》著錄史書之多，反映宋代史學之昌盛；其他公私藏書目錄，如《崇文總目》、《中興館閣書目》、《中興館閣續書目》、《三朝國史藝文志》、《兩朝國史藝文志》、《四朝國史藝文志》、《中興四朝國史藝文志》；以及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尤袤《遂初堂書目》、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鄭樵《通志·藝文略》等等，³⁶皆可見證史學之繁榮。要皆宋代積貧積弱，志在資鑑興亡之體現。其中，史料之編次、史書之修撰，經由寫本傳鈔、印本傳播諸觸媒轉化，推波助瀾，更促進宋代史學之繁榮昌盛，關係一代之學術與文風，不容小覷。

宋代官府對雕版印刷之重視，起於太宗准從李至的奏議，在國子監設官掌理，雕印經史群書。仁宗嘉祐年間（1056-1063）因南北朝諸史秘圖藏本多有闕誤，命曾鞏、劉恕、王安國等儒臣重加校訂。政和中（1111-1118）始畢其役，正史悉數由國子監鑄版頒行。於是《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南史》、《北史》、《隋書》、《唐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後周書》、《舊五代史》先後於杭州鑄版刊行，是為北宋監本《十七史》³⁷。自是之後，至南宋紹興間，兩宋諸史監本，代有造刊，王國維〈兩宋監本考〉論之極詳。歐陽脩纂修《新唐書》、《新五代史》，

³⁵ 陳寅恪稱：「中國史學莫盛於宋」，語見《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240。參考高國杭〈宋代史學及其在中國史學史上的地位〉，《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第4集（長沙：岳麓書社，1983年），頁126-135；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第一章〈續論〉，（臺北：文津出版社，1991.6），頁3-7。

³⁶ 同上，《宋代修史制度研究》，第十一章〈餘論〉，頁201。參考陳樂素《宋史藝文志考證》，〈宋史藝文志研究札記〉，「史學盛」，（韶關：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3），頁703。

³⁷ 時宋太宗淳化五年（994）。詳參《宋史》卷165〈職官五〉；卷266〈李至傳〉，（北京：中華書局，1999.12），頁3909、頁9177。王國維〈兩浙古刊本考〉稱：「宋有天下，國子監刊書，若史書三史、若南北朝北史、若《唐書》、若《資治通鑑》，皆下杭州鑄版。」參考《永樂大典》卷一千七百四十一引《國朝會要》，程俱《麟臺故事》殘本，卷二中〈書籍〉，張富祥《校證》本，（北京：中華書局，2004.4），頁251-281。

薛居正《舊五代史》、司馬光《資治通鑑》、鄭樵《通志》、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袁樞《通鑑紀事本末》、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等史學要籍，大多刊刻流傳，影響當代，沾溉來葉。今日所見宋版，蜀廣都費氏進修堂刻《資治通鑑》、建安黃善夫家塾刻《史記》及《漢書》，眉山程舍人宅刻《東都事略》，皆堪稱善本名槧。以《資治通鑑》而言，宋槧百衲本中即存留七種版本，分別為南宋高宗紹興間刊本、光宗朝刊本、光宗以前刻本、甲十六行本、乙以十六行本、寧宗以後刻本、光宗以後刻本。又有乙十一行本（即涵芬樓影印宋本）、傳校北宋本，版本之多，顯示購求者眾，流傳之廣遠³⁸。若論諸史刊本之類別，則黃佐《南雍志經籍考》區分《史記》舊刊本為大字、中字、小字三種，其他諸史版本，大抵近似³⁹。由兩宋諸史監本品類之眾多，可以想見雕印刊行之繁榮，圖書市場之活絡，知識傳播之快速便捷，勢必影響文化之接受、資訊之運用，左右當代之學術風尚，及文風走向，這是可以斷言的。

雕版刊刻史籍，就監本而言，蓬勃已如上述；其他官刻本、家刻本、坊刻本之雕印史書，由於供需相求，亦競秀崢嶸。姑以《史記》為例，據賀次君、安平秋、張玉春之研究，《史記》在宋代以前，只有鈔本；傳世之鈔本，都是殘本，計有十七種。至北宋方有刊刻本，而兩宋刊本存於今者，有北宋景祐間刊本《史記集解殘卷》、南宋黃善夫家刻《史記三家注》等十六種⁴⁰。《史記》全文凡五十五萬字，卷帙如此宏大浩博，居然能雕印再三，總緣帝王之喜好，圖書市場之需求。刊刻之多，自然流傳廣大、影響深遠。現存《史記》鈔本，計六朝鈔本兩種、敦煌唐鈔卷子三種、唐鈔本六種、日本所藏鈔本六種。此十七種《史記》鈔本，流傳至宋代，成為各公私藏本，可資借閱傳鈔。印本與藏本之傳播方式儘管不同，可以相得益彰，無庸置疑。北宋詠史詩、史論文多歌詠《史記》人物，論說《史記》事件，發揮「過

³⁸ 章鈺〈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述略〉，標點本《資治通鑑》，（臺北：明倫出版社，），頁 12-16。

³⁹ 參考趙萬里〈兩宋諸史監本存佚考〉，《北京大學百年國學文粹·史學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 189-195。

⁴⁰ 賀次君《史記書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58），頁 29-104；安平秋〈《史記》版本述要〉《古籍整理與研究》1987年 1 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張玉春《史記版本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7）；鄭之洪《史記文獻研究》，第八章第二節〈《史記》的版本〉，（成都：巴蜀書社，1997.10），頁 257-261。

秦」與「戒漢」之精義，蓋得《史記》版本流傳、藏書文化之觸發⁴¹。其他史書，除監本外，南宋地方官刻本、南宋郡、府、軍、縣學刻本、以及南宋私（家）刻本、坊刻本所在多有；即以各地區刻書而言，南宋浙江明州、衢州、湖州刊本，四川眉山等蜀刊本，多有史書雕印。雕印史籍，以正史為多，然不局限於正史。由商品經濟供需相求之原理推之，史書之閱讀與接受，市場極大，影響自遠。宋代史學之主潮，著重「資鑑」之歷史意識，實緣於印刷術之出現，書籍之傳播，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等早有洞見。⁴²

（三）佛經道藏之刊印與悅禪、慕道、崇儒之學風

促成雕版印刷之發明與普及，除造紙製墨、雕刻拓印技術之有機配合外，民生日用之社會需求，當是強而有力之推助；特別是佛教在信仰傳播上之熱切需求，更是強大之誘因。抄佛經、塑佛像，以超渡福報親人，為李唐以來佛教信眾之狂熱需求。試觀敦煌所藏寫本，98%以上為佛教典籍，《妙法蓮華經》、《大般若經》、《金剛經》等均有大量複本，可以為證。其他出土文獻關於雕版印刷早期實物，以佛教經典與秘宗咒語印本居多，如成都龍池坊卞家刊本《陀羅尼經咒》（757年後），陝西西安張家坡等地，亦先後出土兩件梵文經咒，一件漢文經咒印刷品。印刷史上更重要發現為咸通九年（868年）印本《金剛經》，以及韓國慶尚北道慶州佛國寺發現新羅景德王十年（751年），雕版之《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⁴³。尤其是漢文大藏經之雕印，動輒5000卷以上，板片常達10萬多塊，書寫、校對、雕版、印刷、流通，需動員千人以上，歷時十餘年以上。可見佛教大藏經之雕版印行，對於雕版人才之培育、刻書中心之形成、書籍裝幀之改良、印本傳播之繁榮等，多有促成之功。

⁴¹ 張高評《自成一家與宋詩宗風》，〈古籍整理與北宋詠史詩之嬗變—以《史記》楚漢之爭為例〉，（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4.11），頁149-188。

⁴² 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宋人の歴史意識—「資治通鑑」の意義〉，五、六，《東洋史研究》第二十四卷第四號（昭和四十一年三月，1966.3），頁8-14；宋代雕印史籍，參考日本尾崎康《以正史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陳捷譯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7）。

⁴³ 李際寧《佛經版本》，上編，〈早期刻印本佛典〉，「中國版本文化叢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12），頁20-25。

宋型文化與唐型文化不同，宋學與漢學風格迥異，筆者以為，此與寫本文化轉變為印本文化有關。三教合一之風氣始於中唐，歷經晚唐、五代，至北宋、南宋，踵事增華，變本加厲，不但蔚為禪悅士風，朝野崇奉道家道教，理學心學儒學競秀爭妍，同時影響宋代文學創作，往往融入禪思、禪語、禪機、禪境，而別開生面；又往往以仙道入詩，而採擷道教語言，展示煉功養生。文學評論則或以禪喻詩、以禪衡詩，大談翻案、飽參、活法、妙悟、意境、雲門三關、不犯正位；或標榜奪胎換骨、點鐵成金、轉凡成聖、學詩如學仙。宋代詩論詩歌，追求「出位之思」⁴⁴，此或以雕版印刷為觸媒、拜圖書流通便捷之賜，始有可能。《禮記·學記》所謂「藏焉、脩焉、息焉、遊焉」，唯有雕版印本購求容易，士人方能朝夕寢饋其中，沈潛優游，深造有得。其中佛經、道藏雖卷帙龐大，仍然多次刊刻印行，供需相求，尤見推轂之功。

漢文大藏經，曾反復雕印、多次出版，每部卷帙皆在 5000 卷以上。自宋太祖開寶四年（971）雕印蜀本大藏經（《開寶藏》5048 卷）以來，終宋之世，又先後刊刻《契丹藏》5790 卷、《崇寧萬壽藏》6434 卷、《毗盧大藏》6117 卷、《思溪圓覺藏》5480 卷、《思溪資福藏》5740 卷、《越城藏》7000 卷、《磧砂藏》6362 卷、《普寧藏》6017 卷等藏經。元代至清代，又有七部藏經雕刻。傳世藏經十六部，兩宋開雕九部，部數過半，盛況可以想見。論者稱：卷帙浩繁之《大藏經》刊刻，對於職業刻工隊伍之壯大，各地刻書中心之形成，印刷技術之提高、出版事業之發展，皆有推波助瀾之效應。⁴⁵理宗淳祐十二年冬（1252），杭州靈隱寺僧普濟取釋道原《景德傳燈錄》、駙馬都尉李遵勗《天聖廣燈錄》、釋維白《建中靖國續燈錄》、釋道明《聯燈會要》、釋正受《嘉泰普燈錄》，撮其要旨，匯為一書，名為《五燈會元》，於寶祐元年刊竣，世稱寶祐本。沈晦六百年後，於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

⁴⁴ 錢鍾書〈中國詩與中國畫〉首倡「出位之思」，指一種媒體欲超越其本身的表現性能，而進入另一種媒體的表現狀態的美學，饒宗頤《畫鶴》謂之「藝術換位」，葉維廉《比較詩學》謂之「媒體及超媒體的美學」，參考張高評《宋詩之新變與代雄》，〈自成一家與宋詩特色〉，（臺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1995.9），頁 94-112。

⁴⁵ 參考李富華、何梅《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第三、四、五、六、七、八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12），頁 69-374。蕭東發〈漢文大藏經的刻印及雕版印刷術的發展——中國古代印刷史專論之二〉，《北京大學百年國學文萃·語言文獻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4），頁 615-622。

覆刻。由集成匯編本之編刻，可知圖書市場之求全求備。近年發現之宋刻本佛經，有山西陵川《大般若波羅密經》、蘇州瑞光寺《妙法蓮華經》、江西瑞昌縣宋墓《金光明經》、山西《佛說北斗七星經》等零本佛經。其他，另外，又有專刻零本佛經之書肆，如南宋杭州陸親坊之沈八郎，眾安橋南街東之開經書舖賈官人宅、棚前南街西經坊之王念三郎家等，可以想見當時之禪風佛影。

諸本大藏經開雕，時間橫跨南北兩宋，刻書地點分布於成都、汴京、燕京、福州、湖州、解州、吳縣、杭州各都市⁴⁶，可見四川、福建、浙江、江蘇、山西、京城開封、北方契丹，皆有藏經之雕印。佛教圖書傳播之無遠弗屆，深入士林人心，形成禪悅風氣，兩宋大藏經九次開雕印行，總卷數高達 53988 卷，燈錄諸作編纂刊行，零本佛經雕印，自有關係。《大藏經》九部，在南北宋之前後刊刻傳播，直接促成佛教禪宗在宋代之流行。從「不立文字」之禪，轉化為「不離文字」之禪，固然跟圖書傳播有關，且兩宋時代之禪宗，如法眼宗、雲門宗、臨濟宗、曹洞宗；以及論宗門語默，所謂如來禪、祖師禪、分燈禪、公案禪、文字禪、默照禪、看話禪等，應該都與佛教禪籍之傳播與接受有密切關係。⁴⁷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十八〈子·道家〉，稱引歷代道家著錄：《宋三朝志》43 部 250 卷，《宋兩朝志》8 部 15 卷，《宋四朝志》9 部 32 卷，《宋中興志》47 家 52 部 187 卷。卷五十一、五十二〈子·神僊〉、〈子·神僊家〉稱引道教著錄：《宋三朝志》97 部 625 卷，《宋兩朝志》413 部，《宋四朝志》20 部，《宋中興志》396 家，447 部，1321 卷。《宋史》卷二百五〈藝文四〉，著錄道家類 102 部，359 卷；神仙類 394 部，1216 卷。由此觀之，道教典籍遠較道家多，大抵在八與一之比例，就《道藏》之編纂而言，宋太宗敕編《道藏》3337 卷，王欽若整理道教經典 4359 卷，編成《寶文統錄》；張君房《大宋天宮寶藏》4565 卷（後撮其精要，輯成《雲笈七籤》122 卷）、徽宗《政和萬壽道藏》5481 卷、《大金玄都寶藏》

⁴⁶ 宿白《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南宋的雕版印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3），頁 88。

⁴⁷ 參考楊曾文《宋元禪宗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10）；周裕鍇《禪宗語言》，（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12）。

6455 卷，多先後雕版印行⁴⁸。圖書流通自然影響傳播接受。

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有〈崇儒〉一門類，下分編纂書籍、校勘經籍、獻書升秩、說書除職諸項。⁴⁹宋代朝廷之崇儒「右文」，由此可見一斑。上述經籍雕印，亦足資佐證。至於兩宋理學家、心學家、道學家，今所謂宋學之代表，如邵雍《伊川擊壤集》、周敦頤《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司馬光《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程頤、程灝《河南程氏文集》、蘇軾《東坡集》、劉子翬《屏山集》、胡宏《五峰胡先生文集》、朱熹《晦翁先生朱文公文集》、張栻《南軒先生文集》、薛季宣《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陳傅良《止齋先生文集》、樓鑰《攻媿先生文集》、陸九淵《象山先生文集》、楊簡《慈湖先生遺書》、陳亮《龍川先生文集》、葉適《水心先生文集、別集》、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包恢《敝帚稿略》、王柏《魯齋王文憲公文集》、金履祥《仁山集》，⁵⁰亦多有文集雕印，學說思想乃得以傳布發揚。至於編纂理學文選為總集，便利閱讀參悟者，宋代亦有胡安國編《二程文集》、朱熹、張栻、林用中編撰《南嶽倡酬集》、真德秀《文章正宗》、佚名《十先生奧論》前集、後集、續集，金履祥《濂洛風雅》等寫本或印本之總集。圖書傳播如是多元，思想家有此知識觸發，乃得以博觀約取、厚積而薄發，理學、道學、宋學之推展形成，印刷傳媒自有催化作用。

三、宋代印刷傳媒、圖書流通與詩分唐宋

對於雕版印刷崛起，成為複製圖書之新寵，蔚為知識傳播之利器，近代中外學者之相關研究，錢存訓先生歸納為三個主流：一是傳統的目錄版本學系統，二是書

⁴⁸ 日本福井康順等監修、朱越利譯《道教》第一卷，〈道教經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6），頁 75-78。

⁴⁹ 原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崇儒》，苗書梅等點校，（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1.9），頁 261-309。

⁵⁰ 兩宋理學家（道學家、宋學家）文集之雕印、傳鈔，可參考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上下），（北京：中華書局，1999.11）。

籍紀傳體之形究，三是印刷文化史之研究，已見上述。印刷文化史之研究，堪稱研究之新課題，係針對雕版印刷之發明、傳播、功能和影響，作因果之分析，進而探討印刷傳媒對學術、社會、文化等層面，引發之變化和產生之後果。論者指出，印刷術的普遍應用，被認為是宋代經典研究的復興，及改變學術和著述風尚的一種原因。⁵¹關於印刷文化史之研究，研究成果不多，其中精彩可觀者，如日本清水茂強調：印刷書籍之普及，影響學術之發展與演變；⁵²美國露西爾·介指出：印刷術之廣泛運用，促使宋代文人之閱讀、記憶、學習改變方法；⁵³日本內山精也證明：印刷傳媒對於文人之作品傳播、創作心態等，都極具影響力。⁵⁴筆者擬借鏡參考上述視點，以探討宋詩特色、詩分唐宋諸問題：

唐宋詩之異同，一方面是文學本身之自然衍化，再方面是宋人自覺之學古通變；其三，則是典範選擇與圖書傳播之相互為用使然。如葉適所言，述說宋調與唐音之消長，宗唐與宗宋之嬗變，其中自有寫本、印本、與藏本圖書之傳播因緣在：

慶曆、元祐以來，天下以杜甫為師，始黜唐人之學，而江西宗派章焉。然而格有高下，技有工拙，趣有淺深，材有大小。……故近歲學者，已復稍趨於唐而有獲焉。曷若斯遠淹玩眾作，凌暴偃蹇，情瘦而意潤，貌枯而神澤，既能下陋唐人，方於宗派，斯又過之。（葉適《水心文集》卷十二，〈徐斯遠文集序〉，《宋詩話全編》第七冊，《葉適詩話》第六則，頁7396）

葉適所論文壇詩風，從蘇黃提倡學杜、宗杜，蔚為江西詩派宗風，而唐音消歇不振，此自《蔡寬夫詩話》、《東觀餘論》討論《子美集》、《子美詩集》刊本，可推其中消息。⁵⁵迨江西詩派標榜詩法，致遠恐泥，於是四靈江湖詩人興起，以學

⁵¹ 同註 8，第十章〈紙和印刷術對世界文明的貢獻〉，頁 356。

⁵² 清水茂著，蔡毅譯《清水茂漢學論集》，〈印刷術的普及與宋代的學問〉，（北京：中華書局，2003.10），頁 88-99。

⁵³ 露西爾·介（Lucile Chia）〈留住記憶：印刷術對於宋代文人記憶和記憶力的重大影響〉，《中國學術與中國思想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4），頁 486-498。

⁵⁴ 內山精也《傳媒與真相——蘇軾及其周圍士大夫的文學》，〈蘇軾文學與傳播媒介——試論同時代文學與印刷媒體的關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8），頁 272-292。

⁵⁵ 胡子《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九引《蔡寬夫詩話》，《後集》卷六引《東觀餘論》，（臺北：長安出版社，1978.12），頁 59，頁 38。

唐宗唐為天下倡，唐音復盛。其中之消長盛衰，按諸出版史料、藏書目錄、文獻傳播，以及宋人之學古通變，要皆聲氣相通，埤鼓相應。唐宋詩之異同，詩之分唐宋，可於此中求之。⁵⁶今再就會通化成、學唐變唐、詩話之傳寫刊刻三方面論述之：

（一）會通化成與「梅迪奇效應」

就《春秋》學而言，宋儒研究之焦點指趣，為《公羊》《穀梁》之微言大義，以及《左傳》之資鑑勸懲，其要旨在發明孔子聖經之書法。其中北宋《春秋》學家如孫復、胡瑗、孫覺、王皙、崔子方、劉敞、王安石、蘇軾、蘇轍；南宋如胡安國、葉夢得、朱熹、呂祖謙、陳傅良、呂本中、李明復諸家可作代表⁵⁷。以宋代經學而言，《春秋》學既號稱顯學；刊刻寫本既流傳廣遠⁵⁸，詩人研讀接受，耳濡目染，自然深受影響，於是形成以《春秋》書法論詩作詩之風氣⁵⁹。此或印本文化之發用，勢所必至，理有固然。

宋代史學繁榮，既稱空前，史書文獻之整理既有如彼之成就，印本圖書流傳既如此便捷，於是宋人以史家筆法論詩作詩，科舉進策與資鑑意識，蔚為史論文之勃興，遂亦順理成章。《全宋詩》載存許多敘事詩、詠史詩、弔古詩、讀書詩，其中出入史書、史事，以及歷史人物者尤多，無論興寄或資鑑，多與宋代史籍刊布流傳有關，尤其是印刷傳媒之崛起。⁶⁰

⁵⁶ 張高評〈印刷傳媒與宋詩之新變自得——兼論唐人別集之雕印與宋詩之典範追尋〉，高雄：中山大學中文系《文與哲》學報第十期（2007年6月），頁227-270。

⁵⁷ 沈玉成、劉寧《春秋左傳學史稿》，第八章第二節、第三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6），頁202-241。

⁵⁸ 《五經》、《七經》、《九經》於宋代刊刻情況，參考曹之《中國古籍版本學》，第四章，一，〈國子監刻書〉；二，〈公使庫刻書〉，（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5），頁192-205；蔡春編《歷代教育筆記資料——宋遼金元部分》，〈書話〉，「雕版印書」、「監本五經板」、「刻本經籍」，（北京：中國勞動出版社，1991.11），頁384-385，頁387。

⁵⁹ 張高評《會通化成與宋代詩學》，貳，〈《春秋》書法與宋代詩學——以宋人筆記為例〉；參，〈會通與宋代詩學——宋詩話「以《春秋》書法論詩」〉，（臺南：成功大學出版組，2000.8），頁55-128。張高評〈詠史詩與書法史筆——以北宋史家詠史為例〉，《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十期，2004年12月，頁39-81。又，張高評《自成一家與宋詩宗風》，第四章〈古籍整理與北宋詠史詩之嬗變〉，第五章〈書法史筆與北宋史家詠史詩〉，（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4.11），頁149-247。

⁶⁰ 同註57，肆，〈和合化成與宋詩之新變——以宋詩特色談「以史筆為詩」之形成〉；伍，〈史家筆法

《全宋詩》中，多見以禪入詩、以禪為詩之作；及〈讀藏經〉之題詠與序跋；詩話、筆記多討論以禪喻詩，則佛藏之刊行與流傳，對宋詩特色之形成必有直接或間接之影響。版本學與宋詩、詩學之整合研究，此一課題，值得繼續探討。筆者以為：宋詩、宋詞、宋文、宋賦，多受道家道教之沾溉，而生發「出位」「會通」之現象⁶¹。對於宋詩之異於唐詩，宋代文學不同於唐代文學，印本圖書流通，亦居關鍵因素。

《易傳》稱：雲從龍，風從虎，言其同聲相求，同氣相應；如影可以隨形，推波可以助瀾。同理可推，雕版刊印、圖書流通、知識傳播，對於學術激盪、文風走向，必有影響與感應。由此觀之，佛經、禪藏⁶²、《老子》、《莊子》、道藏⁶³之整理刊行，從五代到南宋既是熱門類科，反映於詩學與創作，遂體現「以禪為詩」、「以禪入詩」、「以禪喻詩」、「以禪論詩」、「以老莊入詩」、「以仙道入詩」諸課題。其中之受容與反饋，各又如何？值得深究。

宋代詩學極注重詩法，就學養與識見言，學理之儲積，必須博覽群書；藝術之薰陶，得力於遍考前作；就師古與創新言，標榜「出入眾作，自成一家」，其中通變代雄，牽涉到藝術傳統之認同與超越；點鐵成金，關係到陳言俗語之點化與活化；奪胎換骨，致力於詩意原型之因襲與轉易；推而至於句法、捷法、活法、無法諸命

與宋代詩學——以宋人詩話筆記為例》，頁 129-194。史書在宋代的校勘，參考曾貽芬、崔文印《中國歷史文獻學史述要》，〈宋代對歷史文獻的校勘〉，（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4），頁 274-301；史書在宋代之刊刻，參考劉節《中國史學史稿》，十四，〈宋元以來史籍刊刻的經過〉，（臺北：弘文館出版社，1986.6），頁 259-267，頁 269-274。即以《史記》一書而言，宋代即有景祐刊本、紹興刊本、乾道刊本、慶元刊本等八種以上刊本，參考同註 37，38。

⁶¹ 參考李生龍《道家及其對文學的影響》，第七章〈道家思想與宋代文學〉，（長沙：岳麓書社，1998.3），頁 326-348；楊建波《道教文學史論稿》，第三章〈兩宋道教學〉，（武漢：武漢出版社，2001.10），頁 241-354；劉介民《道家文化與太極詩學——《老子》、《莊子》藝術精神》，（佛山：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8）。

⁶² 佛經禪藏在宋代之刊刻，參考方豪〈宋代佛教對中國印刷及造紙之貢獻〉，《大陸雜誌》四十一卷第四期（1970.8）。宋代雕印佛經，達到空前絕後之程度。參考程千帆、徐有富《校雕廣義·版本編》，第四章〈雕印本的品類〉，頁 142-147。

⁶³ 道藏之整理，參考于乃義〈古籍善本書佛、道教藏經的版本源流及鑑別知識〉，《四川圖書館學報》1979年第3期。

題，所謂「規矩備具，而能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而亦不背於規矩」⁶⁴；筆者深信，上述詩學課題，皆與雕版印刷之繁榮，圖書傳播之便捷，士人得書讀書容易有關。試考察宋代詩話之鏤版、筆記之刊行、詩話總集之整理雕印，唐詩選、宋詩選之編輯刊刻，其中之去取從違，無論提示詩美、宣揚詩藝、強調詩思、建構詩學，要皆可經鏤版，而流傳廣大長遠，「與四方學者共之」。朱熹〈鵝湖寺和陸子壽〉所謂：「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舊學之商量，新知之培養，此非有豐富之圖書傳播不為功。由此觀之，宋代詩話、筆記、詩選之雕版刊行，對圖書流通、知識傳播最有影響；對於宋詩特色之生成，亦自有推波助瀾之效用。蓋博覽群書，遍考前作，出入諸家，認同傳統，固然離不開圖書版本；即點化陳俗、轉化原型，甚至超常越規，透脫自在，也無一不與圖書典籍之閱讀與運用有關。

（二）宋刊唐宋別集總集與宋詩之學唐變唐

雕版印刷，為朝廷右文崇儒政策之體現，其圖書選擇，攸關宋人之學古通變，自得成家，大抵與兩宋之文風思潮相呼應，此亦商品經濟供需相求之必然效驗。《易》為憂患之學，《春秋》為經世之書，故兩宋經學之刊行，唯《易》與《春秋》為顯學。

陳寅恪稱：「中國史學莫盛於宋」，表現在國史之記述，舊史之整理，大部編年史《資治通鑑》、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之完成等等，或重直書實錄，或重經世資鑑，大多雕版成書，刊印流傳。就宗教思想而言，佛教藏經在宋代雕版印刷，存留九種版本；道藏亦鏤版刊行，宋人之崇佛、禪悅、好道，印本圖書之出版，自有迴響。試觀宋代詩學講究通變、言意；詩話筆記標榜《春秋》書法，史家筆法，於是詩歌創作亦往往以《春秋》書法入詩，以史家筆法入詩。佛教，尤其禪宗之影響宋代詩話，蔚為以禪喻詩、以禪論詩，創作則以禪語入詩、以禪思為詩思，及以禪學入詩諸現象。道家道教影響宋代詩學與詩歌，如自然、平淡、樸拙、清空、超脫等之體現，奪胎換骨、點鐵成金之借用與轉化，凡此種種，皆是經學、史學、佛

⁶⁴ 參考周裕鍇《宋代詩學通論》，乙編，詩法篇，（成都：巴蜀書社，1997.1），頁146-248。

道思想影響於詩學詩歌，信而有徵者。

宋人詩集、文集之刊行，宋代詩話筆記之雕印，以及宋人爲學唐變唐，而整理唐人別集；爲學古通變，妙悟自得，亦編選唐人詩、選刊宋人詩，其中自有宋人典範之追尋，自成一家之期待在也。吾人皆知宋型文化不同於唐型文化，筆者以爲：其中重大關鍵在印刷傳媒之影響，促成圖書流通之便捷，知識傳播之快速，蔚然引發許多「異場域之碰撞」，形成若干「梅迪奇效應」⁶⁵，不同文類、殊異學科間之會通整合，形成創意開發之無限。因雕版印刷流行，知識傳播快速而多元，促成許多「會通交融」之機會，生發許多「新奇組合」之創意，對於宋詩面對唐詩之盛極難繼，處窮必變，印本之流通傳播，提供了許多開發之生機。論述如下：

學界研究確認，唐人詩文集，傳流後世者，多經宋人整理刊行。陸游〈跋樊川集〉曾云：「唐人詩文，近多刻本，亦多經校讐」，⁶⁶筆者更發現：宋人整理雕印前代詩文集，是講究選擇的，一言以蔽之，多與宋人追求詩歌典範的歷程合拍。如宋詩歷經學白、學晚唐、學韓、學杜、學陶之過程，於是《白氏文集》、李商隱、李賀、賈島詩集，先後雕印之版本較多；尤其宋代有千家注杜，著錄之宋版杜集尚有 129 種；五百家注韓，宋元韓集尚有 102 種；《陶淵明集》兩宋版本大約在 16 種以上。《滄浪詩話·詩體》所列白體、晚唐體、昌黎體，宋人之版本目錄多有體現；清沈曾植稱：「宋詩導源於韓」；徐復觀謂：「北宋詩人都有白詩的底子」；陶淵明詩、杜工部詩爲蘇黃及江西詩派所宗法追慕，奉爲典範學習。自北宋元祐後至南宋，江西詩風席捲天下，舉世宗杜學陶。⁶⁷就商品經濟供需相求之原理推之，流行風潮即是市場導向，雕版印刷與文學風尚，固相互爲用，相得益彰也。試考察北宋詩人之閱讀定勢，白居易、韓愈、晚唐詩人較受青睞，陶淵明、杜甫詩奉爲宗

⁶⁵ 所謂「異場域碰撞」，指不同領域的交會，是一種跨學科之思考技術；異場域之碰撞所爆發的驚人創新，稱爲梅迪奇效應（The media effect）。梅迪奇是中古歐洲義大利佛羅倫斯一位銀行家，曾經資助科學家、詩人、畫家、哲學家、雕刻家經費，促成和金融家、建築師濟濟一堂，彼此交會、切磋、觸發、激盪，於是打破彼此範疇和文化藩籬，其中之創新觀念，促成了文藝復興。參考 Frans Johnsson 著，劉真如譯《梅迪奇效應》，（臺北：商周出版，2005.10）。

⁶⁶ 陸游《渭南文集》卷三 0，〈跋樊川集〉，吳文治《宋詩話全編》本引，頁 5772。

⁶⁷ 同註 56。

法典範，即可推想此中消息。⁶⁸

就宋人選唐詩而言，其中自有學習唐詩優長，追尋詩學典範，建構宋詩宗風，鼓吹詩派風尚之意義在。如李昉等奉勅編撰《文苑英華》一千卷，見宋人之師古學唐；王安石編選《四家詩選》、《唐百家詩選》，見宋詩之宗杜；洪邁編選《萬首唐人絕句》體現江湖之詩風；周弼《三體唐詩》，見宋人之宗法三唐；孫紹遠《聲畫集》，見宋人「詩畫相資」之出位會通；劉克莊《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見南宋「唐宋兼采」之詩風旂向；其他，如趙孟奎《分門纂類唐歌詩》，元好問《唐詩鼓吹》，要皆標榜唐詩，宗法中晚唐，所謂「學唐變唐，而出其所自得」，上述唐詩總集之編選刊刻，可作如是觀。⁶⁹宋人以學唐為手段，為變唐為過程，以自成一家為目標，編選刊印唐人別集總集，自有市場之導向與價值。

再就宋人選宋詩而言，亦可見宋詩體派之流行。考《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宋人編選刊刻之詩選總集，有《西崑酬唱集》、《三蘇先生文粹》、《坡門酬唱集》、《江西宗派詩集》、《四靈詩選》、《江湖集》前集、後集、續集、《兩宋名賢小集》、《瀛奎律髓》，從可見西崑體、東坡體、江西詩派、四靈詩派、江湖詩派，以及江西詩派標榜「一祖三宗」之詩學取向。祝尚書《宋人總集敘錄》，於此頗有著錄。乃至於宋詩別集之編纂刊行，從可見宋詩大家名家之風起雲湧，「江山代有才人出」：如王禹偁之《小畜集》、《小畜外集》，蘇舜欽之《蘇子美集》，梅堯臣《宛陵先生文集》、歐陽脩《歐陽文忠公集》、邵雍《伊川擊壤集》、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王荊文公詩李壁注》、蘇軾《東坡集》、《王狀元集注東坡詩》、施顧《注東坡先生詩》；黃庭堅《豫章先生文集》、《山谷黃先生大全詩注》、《山谷外集詩注》、《山谷別集詩注》；陳師道《後山居士集》、陳與義《增廣箋注簡齋詩集》、《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楊萬里《誠齋集》、范成大《石湖居士集》、陸游《劍南詩稿》、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

⁶⁸ 張高評〈北宋讀詩詩與宋代詩學——從傳播與接受之視角切入〉，《漢學研究》第24卷第2期（2006年12月），頁191-223。

⁶⁹ 張高評〈印刷傳媒與宋詩之學唐變唐——博觀約取與宋刊唐詩選集〉，《成大中文學報》第16期（2007年3月），頁1-44。

戴復古《石屏詩集》等等，生前或稍後，或手訂雕版，或弟子、家族、學侶代為勘定刊印⁷⁰。宋詩之大家名家創作，雖或當下傳鈔，畢竟影響有限；若經雕版印刷，以印製精美之圖書形態面世，其傳播流通之廣大、快速、深入，絕非手抄謄寫所可比擬。圖書傳播既便捷如此，於是「奇文共賞，疑義相析」，必然影響詩話筆記之載錄與體現。詩話筆記所載錄之內容與詩歌創作指向，交相映發，於是共同激盪宋詩特色之形成。

（三）宋詩話之傳寫刊行與宗唐宗宋

〈宋代詩話之傳寫刊刻與詩分唐宋〉研究計畫，為筆者國科會三年期執行中之計畫，研究構想略謂：宋人治學，志在博覽群書，遍考前作；出入諸家，而又回歸傳統，在在離不開圖書版本，如點化陳俗，轉換原型，甚至超常越規，透脫自在，也無一不與圖書典籍之閱讀與運用有關。宋代詩人追求學古變古，學唐變唐，終能超脫本色，而自成一家詩風者，其中若無雕版印刷之觸媒推助，恐難以奏其效而竟其功。詩話筆記之撰寫與編纂，一則記錄讀書心得，再則分享創作經驗，三則提出詩學主張，四則評論詩人詩作，此其大要也。蘇軾〈稼說送張琥〉所謂：「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可借以說明詩話編寫之過程與策略。因此，詩話（含筆記）之編寫，與圖書傳播、知識流通，關係十分密切。詩話從搜集資料，到去取從違，到編寫校讎，到雕版印行，若非通都大邑、經濟繁榮、文化發達、藏書豐富、書坊林立地區，何從借抄、購書，又何從刪汰繁蕪，使菁華畢出？又如何編著，而可成為「文章之衡鑑，著作之淵藪」？若非公家私人藏書，刻書中心書籍流通頻繁，而品類眾多，又何能「出入眾作，而自成一家」？

北宋真宗以來，提倡雕版印刷，所謂「士大夫不勞力而家有舊典」；「善本鈔板，所在各自版行」，加上公藏鈔本，民間藏書家度藏豐富多元，自然有利於詩話

⁷⁰ 參考祝尚書《宋人總集敘錄》，（北京：中華書局，2004.5）；《宋人別集敘錄》（上下），（北京：中華書局，1999.11）；又，王嵐《宋人文集編刻流傳叢考》，（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5），亦頗有發明。張高評〈宋人詩人選集之刊行與詩分唐宋——兼論印刷傳媒對宋詩特色之推助〉，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第二屆兩岸三地人文社會科學論壇」（典範移轉——學科的互動和整合），論文集第三冊，2007年11月18日，頁1-31。

筆記之編印刊行。就詩話總集而言，有佚名《唐宋分門名賢詩話》二十卷、阮閱《詩話總龜》一百卷、計有功《唐詩紀事》八十二卷、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後集一百卷、魏慶之《詩人玉屑》二十卷、蔡正孫《詩林廣記》前後集二十卷，皆曾雕版印行，對當時之文風思潮自有激盪。其他，又有見諸著錄，後世亡佚者，如李頎《古今詩話錄》七十卷、佚名《唐宋名賢詩話》二十卷，任舟《古今類總詩話》五十卷等等，可參郭紹虞《宋詩話考》。就錢鍾書「詩分唐宋」之說言之，宋代詩話之傳寫刊刻，其消長因革，大抵與唐音宋調之辯證有關。自北宋元祐間宋詩特色形成後，宗唐或宗宋之爭隱然成爲詩學討論之重要課題。大較而言，宋代詩話編寫內容，有推崇蘇軾、黃庭堅，發揚江西詩派詩學理論者，則爲主宋調之詩話，如陳師道《後山詩話》、周紫芝《竹坡詩話》、朱弁《風月堂詩話》、張表臣《珊瑚詩話》、吳可《藏海詩話》、范溫《潛溪詩眼》、吳开《優古堂詩話》、許顥《彥周詩話》、《王直方詩話》、《洪駒父詩話》、《潘子真詩話》、唐庚《唐子西語錄》、蔡條《西清詩話》、呂本中《紫薇詩話》、《呂氏童蒙訓》、曾季狸《艇齋詩話》、陳巖肖《庚溪詩話》、趙與虢《娛書堂詩話》、葛立方《韻語陽秋》、劉克莊《後村詩話》等等。

正當蘇黃詩風盛行，江西詩法風行天下之際，別有一派，以反對蘇黃、非薄江西、或修正江西相標榜，如魏泰《臨漢隱居詩話》、蔡居厚《蔡寬夫詩話》、葉夢得《石林詩話》、張戒《歲寒堂詩話》、黃徹《石溪詩話》、嚴羽《滄浪詩話》等等。更有出入諸家，折衷於唐宋詩之優長者，如釋惠洪《冷齋夜話》、楊萬里《誠齋詩話》、陸游《老學庵筆記》、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姜夔《白石道人詩說》、范晞文《對床夜語》、敖陶孫《敖器之詩話》等等。宋代詩話於宋調唐音，無論標榜、反對、或折衷，都與時代風潮相呼應；其編寫雕版之情形，所謂消長榮枯，亦與市場導向、消費心理息息相關。胡仔《苕溪漁隱叢話》爲綜合性質之詩話匯編；方深道《集諸家老杜詩評》、計有功《唐詩紀事》，則爲專輯性質之詩話彙編。上述宋代詩話，或鈔本流傳，絕大部分都經雕版印行，沾溉當代，影響後世⁷¹。要之，

⁷¹ 有關宋代詩話之主要內容，及編寫刊印情況，可參郭紹虞《宋詩話考》，（北京：中華書局，1979.8）；張連第、漆緒邦等編著《中國歷代詩詞曲論專著提要》，（北京：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1.10）；

詩話之編寫刊印，與流行風潮有關；流行風潮左右消費心理，消費心理決定市場導向。詩話其書既經雕印，即是商品，既是商品則涉及成本、價格、利潤、市場競爭、投資風險諸問題。於是供需相求之詩話雕版，固與詩學之閱讀接受、創作反饋埒鼓相應，亦與審美趣味、流行風潮合拍，消長盈虛之間，自然相輔相乘，相得益彰。

由是可推：宋代之雕印經籍，促成儒學復興；史書刊刻，蔚為史學昌盛；佛藏道藏開雕印行，影響士大夫禪悅之風與好道之習；唐人詩文集之整理刊行，與宋詩典範之追求交相呼應，推而至於宋人別集總集之刊印，亦與宋詩之發展嬗變聲氣相通。宋詩追求「出位」，致力學科整合，經學、史學、哲學往往滲透於詩歌詩學；又注重不同文體間之會通化成，時時體現「破體」為文現象，蔚為「新奇組合」之文體變革。推而至於宋詩派別之流衍，宋詩大家名家之蠡出，宋詩之發展與嬗變，種種創造性思考，多有得於印本之多元，圖書之豐富，知識傳播之便捷。凡此，多與雕版印刷之繁榮消息相通。

宋詩所以不同於唐詩，就內涵與思想而言，「詩思」之差異是其中一大關鍵。所謂「詩思」，指詩人對客觀世界或外在環境影響感發之反應與構思。以鍾嶸《詩品·序》準之，唐詩之妙，率由「直尋」；宋詩之美，或出於「補假」。前者向外馳求，以天地、自然、社會、人生為詩材、為詩胎；後者返內探索，以圖書、學問、知識、語文，藉為取資與觸發。前者較重形象、感性，後者較重思辨、理性。王夫之《薑齋詩話》曾批評宋人「除卻書本子，則更無詩」，「總在圈績中求活計」，率指宋詩此種本色。平情而論，據此苛責宋人作詩習氣，蓋有意無意間忽略雕版印刷之發達，印本文化之蓬勃；以及由此而衍生之學古、閱讀、熟參、出入諸問題。錢鍾書討論「詩畫相資」，曾提及「出位之思」（Andersstreben）；錢鍾書等所謂「出位」，專指「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筆者權衡宋型文化「會通化成」之特色，引申發揮，類推詮釋詩禪交融，以仙道入詩、以理學入詩、以老莊入詩、以《春秋》書法為詩、以史家筆法為詩方面。「出位之思」之實踐，攸關不同學科間之整合融會，屬於「新奇組合」之創造思維。因此，宋代文學之「出位之思」，客觀外緣方

蔣祖怡主編《中國詩話辭典》，〈詩話內容評析〉，（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1）；李裕民《宋史新探》，〈宋詩話叢考〉，（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1），頁 341-362。

面，必然受雕版印刷、印本文化之激盪，推波助瀾之餘，始有可能進行「出入眾作」、「學古通變」、「會通化成」，而「自成一家」⁷²。黃庭堅稱：「詩詞高勝，要從學問中來！」蓋多讀書，則胸次高；博學多識，文章有根據；且所見既多，自知得失，下筆知所取捨，作詩方能去陳、出新、自得、入妙⁷³。凡此，若無雕版印刷崛起，印本與寫本爭輝，甚至印本取代寫本諸風潮與外緣，則兩宋詩人失去圖書傳媒之憑藉與觸發，將何所據依而「出位之思」？何所博觀而「會通化成」？

就宋詩之創作而言，「出位之思」是立足於詩歌，又跳出詩歌本位，將詩思伸展到其他學科，汲取化用其優長與特色，作為詩歌創作之參考與借鏡。由此可見，「出位之思」牽涉到學科整合，而「會通化成」、「自成一家」自是它的效應與結晶。上文提及宋代詩人盡心「出位之思」的超越，分別與繪畫、禪宗、老莊、仙道、儒學進行「會通化成」；在詩法方面亦致力超越本色，將詩思之觸角伸展到《春秋》書法、史家筆法、書道藝術，與雜劇藝術。本論文擬以經籍之雕印、史籍之刊刻，以及佛經道藏之刻印情形，論證《春秋》書法、史家筆法、以禪入詩、以仙道入詩諸「出位之思」，所以能改造宋詩體質，促使宋詩疏離唐詩之本色，而蔚為「詩分唐宋」之所以然。筆者以為，雕版印刷之繁榮，印刷傳媒之便捷流通，自是其中一大關鍵。

四、結論

知識傳播之載體，由甲骨，而鐘鼎，而簡帛，而寫卷，愈進而愈便於人。迨五代而雕印經書，宋初以來右文崇儒，於是複製圖書之技術，除謄寫抄錄外，再添加鏤板印刷，印刷傳媒之繁榮昌盛，蔚為印本文化。論者稱兩宋三百年間，刻書之多，

⁷² 參考拙作〈從「會通化成」論宋詩之新變與價值〉，《漢學研究》十六卷一期（1998.6）；《會通化成與宋代詩學》，（臺南：成功大學出版組，2000.8）；〈自成一家與宋詩特色〉，《宋詩之新變與代雄》，頁 67-141。

⁷³ 參考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七，吳喬《圍爐詩話》卷二，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一。

地域之廣，規模之大，版印之精，流通之廣，都堪稱前所未有，後世楷模，號稱雕版印刷之黃金時代。如此鋪天蓋地的圖書傳播方式，是否與中古歐洲谷登堡之活字印刷效應類似？對宋代之學風與士習是否有所激盪？對於詩壇、文苑、學界、教育界之閱讀接受、撰述發表，是否生發影響與反饋？值得關切與探討。

雕版印刷崛起發展於宋代，形成印本文化，與寫本（藏本、稿本、抄本）競妍爭輝，對於知識傳播挹注一般洪流。至南宋高宗年間，印本與寫本之為圖書傳媒，勢均力敵；至寧宗、理宗時（1195-1264 在位），刻本數量已超過寫本；至度宗咸淳間（1265-1274），印本書籍已席捲圖書市場，成為知識傳播之主流與新寵。本論文呼應錢存訓先生之提倡，關注寫本與印本圖書對於知識傳媒之消長，企圖對宋代之印刷文化史作研究，以討論印本圖書之傳播、功能和影響為核心。獲得下列觀點：

- 一、印刷傳媒因應宋朝右文崇儒之政策，由提倡、推廣而繁榮昌盛；雖「天下未有一路不刻書」，然以傳統之寫本複製圖書，仍佔重要比例。國子監、到各級學校、書院，士人讀書，藏書家校書，仍以謄寫抄錄為主。所謂「書市之中，無刻本則抄本價十倍」之現象，印本崛起後，仍然存在。
- 二、雕版印刷有「易成、難毀、節費、便藏」之長處，又有化身千萬，無遠弗屆之優勢。因此，足與寫本（藏本、稿本、抄本）競妍爭輝，然論利用厚生，便利士人，印刷傳媒當居首功。印刷圖書之為傳媒，對於宋朝以前及當代的文獻典籍，頗能作較完整而美好之保存，從而有助於流傳與發揚，對於文化傳承，貢獻極大。或稱為知識革命，實不為過。
- 三、印本普及流傳，相對於宋以前，士人閱讀圖書增多一大便利。筆者推想：四部典籍持續刊行後，蔚為兩宋文明之昌盛；經籍之雕印，造成經學之復興；史籍刊刻，助長史學之繁榮；思想義理圖書之刊印，蔚為宋學之創發；佛經道藏之雕版，促使宋人悅禪、慕道、崇儒之風尚。篇幅所限，舉證論說，容後再議。
- 四、宋代知識傳播之媒介，除傳統之寫本（藏本、稿本、抄本）外，印刷傳媒異軍突起，加入圖書流通市場。士人因為置書容易，博觀厚積蔚為時代風氣，於是破體為文、出位之思，成為宋代文學特色之一；師古與創新，出

入眾作與自成一家，舊學商量與新知培養，規矩法度與透脫自在間，「會通化成」之創意，「新奇組合」之生機，始終是宋代詩學之主要課題，此或與印刷傳媒之影響有關。

- 五、宋人爲學古通變，往往整理雕印唐人別集，選刊唐人詩作，同時刊刻宋人別集與詩選；所選所刊，往往與宋人典範之追尋，文風之趨向合符。詩話筆記之爲圖書，或紀錄讀書心得，或分享創作經驗，或提出詩學主張，或評論詩人詩作，若非圖書流通便捷，會通諸家，其勢不能。因此，詩話之編寫刊印，與寫本（藏本、稿本、抄本）、印本之圖書傳播，關係密切。
- 六、對於宋代士人而言，雕版印刷改變知識傳播的方法和質量，進而影響閱讀之態度、方法、環境，以及創作之習性、評述之體式、審美之觀念，和學術之風尚，對宋代之文風士習頗多激盪。因應右文崇儒政策，科舉考試、書院講學、教育普及、著書立說，皆緣印刷傳媒之推助，而有加乘之效果。
- 七、由此觀之，印刷傳媒堪稱唐宋變革之催化劑，宋代之爲近世特徵之促成者。學界探討唐宋變革、宋型文化、唐宋詩異同、唐宋詩之爭、宋詩特色、詩分唐宋諸課題，印刷傳媒對於文風士習之影響，或可作爲考察之切入口，研究之觸發點。

引用文獻

一、古籍原典

- 《夢溪筆談》，宋·沈括，香港：中華書局，1987年4月
- 《麟臺故事》，宋·程俱，張富祥《校證》本，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4月
- 《苕溪漁隱叢話》，宋·胡仔著，臺北：長安出版社，1978年
- 《渭南文集》，宋·陸游，曾棗莊主編《全宋文》第二二二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8月
- 《宋史》，元·脫脫等編纂，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12月
- 《永樂大典》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6月
- 《圍爐詩話》，清·吳喬，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本，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

年 12 月

《昭昧詹言》，清·方東樹，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年 6 月

《宋會要輯稿·崇儒》，清·徐松輯，苗書梅等點校，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1 年 9 月

二、近人專著

《史記書錄》，賀次君，上海：商務印書館，1958 年

《詩詞散論》，繆鉞，臺北：開明書店，1977 年

《漢唐史論集》，傅樂成，臺北：聯經文化公司，1977 年 9 月

《宋詩話考》，郭紹虞，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 8 月

《靜安文集續編》，王國維，上海：上海書店，1983 年

《比較詩學》，葉維廉，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3 年 2 月

《中國史學史稿》，劉節，臺北：弘文館出版社，1986 年 6 月

《談藝錄》，錢鍾書，臺北：書林出版公司，1988 年 11 月

《道教》第一卷，日本福井康順等監修、朱越利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 6 月

《宋代修史制度研究》，蔡崇榜，臺北：文津出版社，1991 年 6 月

《中國歷代詩詞曲論專著提要》，張連第、漆緒邦等編著，北京：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1 年 10 月

《歷代教育筆記資料—宋遼金元部分》，蔡春編，北京：中國勞動出版社，1991 年 11 月

《中國古籍版本學》，曹之，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 年 5 月

《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嚴紹盪，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 6 月

《春秋左傳學史稿》，沈玉成、劉寧，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 6 月

《中國古代印刷史》，羅樹寶，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93 年 3 月

《以正史爲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日本尾崎康，陳捷譯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年 7 月

- 《中國古典文學風格學》，吳承學，廣州：范城出版社，1993年12月
- 《中國印刷術的起源》，曹之，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3月
- 《宋版書敘錄》，李致忠，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年6月
- 《宋詩之新變與代雄》，張高評，臺北：洪葉文化公司，1995年9月
- 《中國詩話辭典》，蔣祖怡主編，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1月
- 《宋代詩學通論》，周裕鍇，成都：巴蜀書社，1997年1月
- 《史記文獻研究》，鄭之洪，成都：巴蜀書社，1997年10月
- 《道家及其對文學的影響》，李生龍，長沙：岳麓書社，1998年3月
- 《宋史新探》，李裕民，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1月
- 《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宿白，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3月
- 《禪宗語言》，周裕鍇，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
- 《宋人別集敘錄》（上下），祝尚書，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11月
- 《中國歷史文獻學史述要》，曾貽芬、崔文印，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4月
- 《會通化成與宋代詩學》，張高評，臺南：成功大學出版組，2000年8月
- 《古代印版通論》，李致忠，（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11月
- 《中國藏書通史》，傅璇琮、謝灼華，寧波：寧波出版社，2001年
- 《金明館叢稿》二編，陳寅恪，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7月
- 《史記版本研究》，張玉春，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7月
- 《道教文學史論稿》，楊建波，武漢：武漢出版社，2001年10月
- 《宋元版刻圖釋》，陳堅、馬文大，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年
- 《宋史藝文志考證》，陳樂素，韶關：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
- 《中國古代書籍紙墨及印刷術》，錢存訓，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12月
- 《佛經版本》，李際寧，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
- 《宋人文集編刻流傳叢考》，王嵐，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
- 《清水茂漢學論集》，（日）清水茂著，蔡毅譯，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10月
- 《中日「書籍之路」研究》，王勇等，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10月

- 《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李富華、何梅，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12月
- 《宋人總集敘錄》，祝尚書，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5月
- 《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錢存訓，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5月
- 《內藤湖南研究》，錢婉約，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7月
- 《中國出版史料》，宋原放編，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0月
- 《自成一家與宋詩宗風》，張高評，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4年11月
- 《書籍的歷史》(Histoire Du Livre)，(法)弗雷德里克·巴比耶(Frederic Barbier)著，劉陽等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1月
- 《日本藏漢籍珍本追蹤紀實》，嚴紹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5月
- 《傳媒與真相——蘇軾及其周圍士大夫的文學》，(日)內山精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8月
- 《道家文化與太極詩學——《老子》、《莊子》藝術精神》，劉介民，佛山：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
- 《梅迪奇效應》，Frans Johansson 著，劉真如譯，臺北：商周出版社，2005年10月
- 《距離與想像——中國詩學的唐宋轉型》，淺見洋二，王水照主編《日本宋學研究六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
- 《宋元禪宗史》，楊曾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10月
- 《印刷書的誕生》(The Coming of the Book)，費夫賀(Lucien Febvre)、馬爾坦(Henri-Jean Martin)著，李鴻志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12月

三、期刊論文

- 〈宋代佛教對中國印刷及造紙之貢獻〉，方豪，《大陸雜誌》四十一卷第四期，1970年8月
- 〈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傅樂成，原載《國立編譯館館刊》一卷四期，1972年12月；後輯入《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7年9月

- 〈古籍善本書佛、道教藏經的版本源流及鑑別知識〉，于乃義，《四川圖書館學報》1979年第3期
- 〈宋代史學及其在中國史學史上的地位〉，高國杭，《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第4集，長沙：岳麓書社，1983年
- 〈論宋代科舉取士之多與冗官問題〉，張希清，《北京大學學報》1987年第5期
- 〈《史記》版本述要〉，安平秋，《古籍整理與研究》1987年1期
- 《宋代私家藏書補錄》，方建新，《文獻》1988年1-2期
- 《南宋私家藏書再補錄》，方建新，《宋史研究集刊》，1988年
- 《兩宋登科人數考索》，何忠禮，《宋史研究集刊》第二集，1988年
- 《北宋私家藏書再補錄》，方建新，《古文獻研究》，1989年
- 〈兩宋諸史監本存佚考〉，趙萬里，《北京大學百年國學文粹·史學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 〈漢文大藏經的刻印及雕版印刷術的發展——中國古代印刷史專論之二〉，蕭東發，《北京大學百年國學文萃·語言文獻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4月
- 〈從「會通化成」論宋詩之新變與價值〉，張高評，《漢學研究》十六卷一期，1998年6月
- 〈中日合作複製日本國宮內廳書陵部藏宋元版漢籍之現狀〉，安平秋，漢學研究中心、高校古委會主辦「第三次兩岸古籍整理研究學術研討會」，2001年4月18-19日，台北市
- 〈漢籍東傳日本的軌跡與形態〉，嚴紹盪，漢學研究中心、高校古委會主辦「第三次兩岸古籍整理研究學術研討會」，2001年4月18-19日，台北市
- 〈留住記憶：印刷術對於宋代文人記憶和記憶力的重大影響〉，露西爾·介（Lucile Chia），《思想家》II：《中國學術與中國思想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
- 〈詠史詩與書法史筆——以北宋史家詠史為例〉，張高評，《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十期，2004年12月

- 〈宋人撰述流傳麗、鮮兩朝考〉，鞏本棟，張伯偉編《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5月
- 〈越南古籍刊刻述論〉，劉玉珺，張伯偉編《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5月
- 〈雕版印刷之繁榮與宋代印本文化之形成—印本之普及與朝廷之監控〉（上），張高評撰，《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十一期，高雄：麗文文化公司，2005年12月
- 〈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張廣達，《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12月
- 〈何謂「唐宋變革」？〉，柳立言，《中華文史論叢》總第八十一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
- 〈東亞漢籍版本學序說——以印本為中心〉，陳正宏，張伯偉主編《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二輯，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5月
- 〈〈書籍的流通如何影響宋代文人對文本的觀念〉〉，美·艾朗諾，《第四屆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年10月
- 〈北宋讀詩詩與宋代詩學——從傳播與接受之視角切入〉，張高評，《漢學研究》第廿四卷第二期，2006年12月
- 〈論域外所存的宋代文學史料〉，鞏本棟，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第22卷）
- 〈印刷傳媒與宋詩之學唐變唐——博觀約取與宋刊唐詩選集〉，張高評，《成大中文學報》第16期，2007年3月
- 〈印刷傳媒與宋詩之新變自得——兼論唐人別集之雕印與宋詩之典範追尋〉，張高評，高雄：中山大學中文系《文與哲》學報第十期，2007年6月
- 〈宋人詩人選集之刊行與詩分唐宋——兼論印刷傳媒對宋詩特色之推助〉，張高評，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第二屆兩岸三地人文社會科學論壇」（典範移轉——學科的互動和整合），論文集第三冊，2007年11月18日
- 〈中國雕版印刷術之全盛時期〉，T·F·Carter：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向達譯，原載《圖書館學季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